



我在港台三十年

- WO ZAI GANGTAI •
- SANSHI NIAN •
- 陶耀华 •
- 湖北人民出版社 •



我在港台三十年

人民出版社·

我在港台三十年

陶耀华
(汪幸福整理)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襄樊日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3插页 10.2万字

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5,000

统一书号：11106·215 定价：1.05元

ISBN 7-216-00001-3/K·1

开 篇 话

我是湖北省黄冈县但店区捉马岗乡寻马岭村人，生于一九一四年。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我参加了国民党部队，先后在鄂东行署特务大队、湖北省保安二团、麻城县自卫大队、武汉行辕军官大队、黄冈县贺店乡公所、一二六军任过排长、连长、营长、乡长、副团长、上校参谋等职，一九五〇年逃到香港，一九五三年去台湾，在台湾获得退役陆军少将衔。

一九七九年五月，我在《告台湾同胞书》的感召下，乘到香港旅游的机会，摆脱台湾“赴港观光旅游团”和特务的追踪，毅然回到了人民的怀抱。

我从台湾辗转回到大陆已经七个年头了。七年来，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下，不仅生活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享受了与儿孙们在一起的天伦之乐，政治生命也获得了新生。我先后当选为县人民代表、政协委员。每当

想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的关怀和爱护时，我心里就感到十分内疚。因为我过去干了许多对不起人民、对不起共产党的事；全国解放后，我又背离人民，潜逃到香港、台湾，使自己的大半生在颠沛流离中白白浪费；一九七九年回归后，年过花甲，旧病复发，成了朽木，不能为轰轰烈烈的四化建设添一口砖，加一片瓦。

我有一位朋友，是人民解放军的离休将军，他的住地离我家不远，经常到我家来看我。今年春节后的一天，我对他说：“我一生快完了，但没有做一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，一想到这里，心里不是滋味，难过极了。”这位老将军说：“你还是可以做点事的。你是《告台湾同胞书》发表后，最先从台湾回到大陆的人员之一，而且经历坎坷。你如果把在香港、台湾的三十年痛苦经历写出来，不是一部很好的教材吗？”这位老将军还对我说：“解放初期，跟随蒋介石逃到台湾的二百万军政人员，大部分与你有同样的经历。可以说，你的经历，是许许多多去台湾人员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。”

这位老将军的一席话，启发了我，经过考虑后，我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。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中共黄冈县委统战部的负责同志，我的想法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和支持，并派汪幸福同志帮我搜集材料，整理文稿。另外，也得到县博物馆董子儒同志的一些帮助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我的这本《我在港台三十年》终于出来了。如果这个本子对广大读者能起到一点认识和教育作用的话，这就是我为四化建设出的一点微力。

这里，我要向读者作两点说明：第一点，由于台湾当局

残酷打击迫害不同政见者，为顾及我在台湾的朋友的安全，我不得不把我关系密切的几位朋友的真实姓名隐去，书中的名字是由我代取的。另一点由于我的记忆力太差，书中所叙的有些事情时间又太长，疏漏错误之处一定很多，恳切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。

陶耀华

一九八六年九月于黄州

目 录

一、刑期脱逃·····	1
二、鱼游釜中·····	14
三、当牛做马·····	23
四、结伙乞食·····	31
五、又入牢房·····	39
六、含辛茹苦·····	45
七、寄人篱下·····	51
八、虚职空衔·····	61
九、出走朱家·····	67
十、颠沛流离·····	75
十一、斗赢达贵·····	84
十二、帮人买妻·····	92
十三、天降祸殃·····	100

十四、“荣民”不荣	108
十五、心病难医	115
十六、秘听广播	126
十七、逃离台湾	134
十八、枯木逢春	147

一、刑 期 脱 逃

一九四九年春，人民解放军直逼武汉。我当时在白崇禧的一二六军任上校参谋，一听说解放军快到武汉，我们如惊弓之鸟，望风而逃。我们先逃到湖南，后又逃到广西桂林、梧州、南宁。白崇禧当时的打算是从广西钦州乘船到海南岛，再在那里与共产党抵抗。万万没有想到，我们部队刚到广西博白，还没有到钦州时，人民解放军风驰电掣般从贵州插过来，先占领了钦州，拦住了我们逃往海南岛的去路。

解放军一占领钦州，又立即将博白团团围住。我们这个一二六军，是由国民党的一些地方自卫大队和被解放军打垮的残余部队整编的，大多数与解放军交过锋，有的还被俘虏过多次，战斗力很差，所以解放军一围上来，我们的部队就风声鹤唳，乱作一团，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。解放军发起总攻后，如风卷残云，很快就解决了战斗。我们的人员死的死、伤的伤、逃的逃，我和剩下的人员一起，当了解放军的

俘虏。

我被俘后，一位解放军军官问我今后怎么办，想到哪里去，我说回家当农民种田，哪里也不去。因为我当时带着家眷，除了我和妻子外，还有四个孩子，大孩子只有十三岁，小的只有一岁多，拖儿带女一大群，到哪里去也不方便。我当时还有一种想法，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，大陆今后的天下是共产党的，我回去后，向人民政府请罪，争取宽大处理，与妻子、儿女们在一起种田过日子就行了。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，我带着妻子儿女，乘人民解放军的便车回到武汉，再由汉口乘船回家中。哪知，我回家只几天就被政府逮捕了。我知道自己被逮捕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我曾应国民党黄冈县政府之邀，在贺店乡兼任了五个月的乡长。在兼任伪乡长期间，我勾结驻扎在浠水县一带的桂系部队，凶狠残暴地杀害了数名鄂东地下共产党员，还干了一些强行抓丁派款和勒索群众的坏事。

一九五〇年春节过后，但店人民法庭在但店街上的中心广场开公审大会，审判我和清乡委员丰楚川，并决定在会后将我们两人就地枪毙。公审大会结束前，丰楚川提到台下去枪毙了。当法庭庭长宣布判处我的死刑并马上要执行时，有两个解放军战士火速送了一封信到台上。这封信是谁写的，内容是什么我不知道，只知道过了大约十分分钟左右，法庭庭长又宣布判我死刑暂缓执行。过了三个月，人民法庭又改判我有期徒刑十五年，送叶家洲农场劳动改造。

叶家洲农场在武汉至团风之间的一个沙洲上，四面环水。人民政府为改造犯人，在那里办了一个劳改农场。我到叶家

洲的时候，心情虽不大好，但又觉得这到底比在监狱强。我当时想，这次被判十五年徒刑，有个命在，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劳动改造十五年后，我也只有四十多岁，再回去好好过日子。我如果在这里老老实实劳动，立功赎罪，能够争取提前释放回家就更好。

一九五〇年九月的一天，我们突然听说人民政府要惩处一大批恶霸、土匪、反革命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心里紧张起来。紧张之余，我又总是往好处想，我想，在这个农场劳动的犯人大多数没判刑，我是判了刑的，属于处理了的案件，总不会判了十五年，又拉去枪毙吧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和同屋的犯人说起这些，他们也说判了刑，不会枪毙的，要枪毙，上次在但店街上就枪毙了。

大约过了十多天，临到我出差，管教人员派我到叶家洲对面的一个小镇去驮大米。走到街上，我十分注意街上人们说话的内容和墙上贴的标语之类的东西。走到街中心时，我看到了一张很大的布告，布告上宣布枪毙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、土匪、恶霸。我还记得原黄冈县的自卫大队长王啸峰排在第一名。看到这个布告，我心里又紧张起来，担心自己被枪毙。

到米店驮米时，我看到铺台上有一张报纸，连忙拿过来看。我看报纸的目的，是想根据上面登的消息看外面的形势，分析政府对我们犯人的政策有无变化。当我把报纸一打开时，看到上面有一条消息，说是各级各部门关押的案犯马上要交公安部门管理，别的部门都不能关押和处治。看到这个消息，我全身一热，心里异常的紧张。我想，如果要是那

样，今后可能还要枪毙人，说不定我也跑不了。回来的路上，由于心里紧张过度，全身无力，路也走不动。肩上驮着一百多斤米，两只脚每牵动一步，象上刀山一样难。晚上，我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我当时站在反动派的立场上，恨共产党夺了我们的天下，怨国民党的当权者太无能，带着我们下边的人吃亏，我又后悔前些年当那几个月的乡长时吃了“窝边草”，得罪了本乡本土的人。

第二天吃过早饭，我拿着锄头与其它几个犯人到地里去干活。约莫九点多钟，我看见对面江堤上走来了二十多个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，就猜想是不是又来提人去枪毙。因为那段时间经常提犯人出去，只见犯人走，不见犯人回，我害怕把自己提出去枪毙。

解放军过江来后，只见那个带队的与看管我们的负责人低声地交谈了一阵。我们这些犯人很紧张，各人有心思，吃不进饭，大家都扒了几口饭便把饭碗放下了。到了晚上，管教负责人发现我们心神不安，便来到犯人住的棚子里对我们说：“你们不要想这想那，也不要紧张，解放军是来这里有事，不是提人的。”尽管管教人员为我们宽心，但我们还是不太相信。

第二天吃完早饭，我们还未上工，那一队解放军吹哨子集合，二十多个解放军整整齐齐地站了两排。带队的解放军在管教负责人的陪同下，走到我们的住地问：“哪个是陶耀华？”我马上站起来答应说：“我就是。”那个带队的解放军军官说：“那好，请跟我回县里去一下。”他这一说，我一切都明白了，这是提我出去枪毙的，原来判的十五年徒刑不够，要我

偿还血债了。这次与我一起提出去的，还有鄂东一带有名的大恶霸邵鹏程的侄儿邵达毛。^①

我和邵达毛跟着解放军来到江边时，那个带队的解放军叫战士们把我们捆起来，估计他们可能是怕我们投江或是逃跑了。两个战士拿出绳子立即把邵达毛捆得严严实实的。我见解放军捆了邵达毛又要捆我，便对那个带队的解放军说：“我是一个早已判了刑的人，在农场老老实实在地接受改造，服从管教，安心守法，没有做一点坏事，你说叫我回县里去，我也不是不跟你去，我跟你们一路也跑不了，何必要捆我呢？”那个带队的解放军见我这样说，望了我一会，就对两个战士说：“还是给他穿个背心（一种简易的捆法），绳子带松一点。”这样，我们两个人一个捆得紧，一个捆得松。

船靠岸后，我边走边想，这次捉我到县里，虽说没有正式向我宣布要枪毙，估计是要枪毙的。这里离县政府所在地团风还有十七、八里路，在这一段路程里，还能不能想办法逃掉呢？我当时的想法是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，能够跑，就要想办法跑掉。我在叶家洲没有要解放军捆绑紧，就是想在路上借机逃跑。上了江堤，我看了一下地形，四周光秃秃的，没有障碍物，觉得在这里不便逃跑。

走了几里路，我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个小村庄，村子周围有个竹园，靠右边还有个山。我认为这里的地形比较好，要逃跑，就要在这个地方跑，如果再往前走，就要到县城，到了县城，一切都完了。我当时还想，要逃跑就要冒生命危险

^① 据我所知，邵达毛后来被枪毙了。

险，这次如果跑成功了，命就能活下去，没有跑成功，就死在这里。于是，我狡黠地对那个带队的解放军说：“长官，我早上起来没有解大便，现在要解大便。”那个带队的解放军听我说要解大便，真的相信了，他把哨子一吹，叫战士们就地休息。我见他们坐在地上休息了，就离开他们去“解大便”。走了约三十米远，一个当兵的把枪一提，大声喊：“站住，再不准走远，再走，我要开枪！”他这一喊，我不害怕，因为我估计他这时是不会开枪的，我还是硬着头皮往前走了几步。我是军人出身，知道每往前走一步，射击距离就远些，击中就困难些。我看到那个解放军战士真的用枪瞄着我，就慢慢地停下，把裤子解开，蹲下去了。我虽然蹲在地上，眼睛却死死盯住解放军。恰在这时，江心来了一艘兵舰。那时兵舰不多，人们看到它都感到很稀奇。解放军战士见我在“解大便”，都把视线转向江里，去看正在江中航行的兵舰。我乘他们没有注意我，便把裤子提起来，拔腿就跑。

我大约跑了二十多步，解放军就发现了，其中有个战士高声喊：“犯人跑了，快追呀！”接着，枪声也响起来了。我见解放军又喊又打枪，便加快速度拼命往前跑。我那时在劳改农场经过劳动锻炼，身体练得很好，跑起来象飞一样。解放军战士是全副武装，跑起来没有我快，这样，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。不过，解放军要是不打枪，我还难以逃跑，因为他们一打枪，前面村里的老百姓害怕，赶快把门关了，前面没有人拦我。假使他们不打枪，村里的老百姓见有犯人逃跑，有一两个人拦一下或指一下我跑的方向，我也跑不掉。

我跑到村子里去后，很快地钻到村右边的竹林里去了。这个竹园的竹子又大又密，人钻进去不易发现，到了竹园，解放军在明处，我在暗处，他们难找我，我却好逃避他们。我进竹园不到几分钟，解放军追上来了。他们进竹园，我就从竹园跑出来，他们出竹园，我又钻进去。我在竹园里清楚地听到一个解放军说：“这个家伙跑得好快呀！”他们在竹园里没有找到我，又继续往前追去了。我乘解放军追到前边去的机会，在竹园里找块石头坐下来歇一口气，再把身上的绳子解下来。过了一会，我观察到村子外边没有人，便走出竹林，往村右边走去，走了约半里路就上了山。这个山不大，但山上的树木很密，茅草也颇深，很好藏人。从上午一直到晚上十二点，我就睡在山上的茅草里。

晚上十二点左右，已是夜深人静。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口里又干又渴。我在山上找了一个水凼子，喝了几口冷水，便往山下窜。往哪里去呢？朝前走，又怕解放军设了哨。想来想去，我觉得往回走比较安全。于是，我又往叶家洲的那个方向走。大约走了二十多分钟，天突然下起雨来，我连走带跑，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叶家洲对面的江堤边。那时，堤边有个几户人家的小村庄，村头有个做小生意的周老头，是我经常过江认识的，我对他的情况很了解。我到这里来找他，一来是搞点吃的，二来是请他帮几个钱做路费逃跑。

我走到周老头门口时，不敢用声喊，用手轻轻地去拍门。拍了十几次，里面没有人答应。我估计周老头今晚不在里面住。看到这个情况，我决定把周老头的门锁搞掉，再进去弄点吃的，拿几个钱。我长这么大，虽然在国民党部队里

抢劫过老百姓的财物，却还没有象这样偷人家的东西。今天为了逃命，要做一次偷盗了。我把周老头的门锁扭了后，进去把芝麻饼子拿了五个吃了。吃完又在周老头的钱箱子里抓了一把钱塞进口袋里，钱的具体数字有多少也不清楚。我见外面的雨下得很大，头上没有遮雨的东西，便把周老头装货用的麻袋拿了一个蒙在头上。从周老头家出来走了约二十多步，头上的麻袋全部被雨淋湿，压在头上很重，我又把它甩在地上。

从这里再往哪里去呢？我站在雨中考虑了一下，觉得逃到武汉去比较合适。因为武汉城市大，人口多，容易躲藏，再加上武汉的交通方便，如果再往外地逃，也好走些。

主意打定后，我便冒雨往团风那个方向走。为了逃命，我不顾一切地往前走，深一脚，浅一脚，遇河过河，遇田过田。到了团风前边的赤山桥，我的鞋里又是泥巴又是水，不起作用了，我便把鞋脱下来拿在手里，打着赤脚跑。大约在凌晨五点，我赶到了黄州江边的长圻廖。这时，我身上的衣服湿得紧贴着肉，一丁点干的也没有，两只脚上到处是伤口，小腿肿得象个水桶样。

为了早点赶过江去，我跛着脚到江边找渡船，正好那天有个渡船的老头在江边等着渡客。我上到渡船上，要那个老头快点把我渡过去。那个老头说渡一个人划不来，等到有五个人再渡。我是个逃犯，想赶快走，哪里等得及，于是，我对渡船的老头说：“老船工，我有点急事，想早点过去，你把我渡过江，我付五个人的船钱。”那个老头听说我一个人付五个人的钱，同意把我渡过江。船到鄂城，天已大亮，我把在

叶家洲周老头家搞的钱搜出来给了渡船的老头，那个老头把钱一数，正好是五个人的钱。

到了鄂城，我的脚已痛得不能走路了。当时，我很想在鄂城乘船到武汉，但又怕乘船不安全。考虑再三，决定不乘船，从鄂城慢慢往武汉走。由于脚痛得厉害，走路很艰难，我在路边的一棵树上折一根小杈做拐杖，拄着一步步地往前走。我在路上遇到人，头也不敢抬，肚子饿了，有时乘天黑在沿路村子里讨点吃，有时避着人扯几个红苕吃，晚上在沿路的稻场边的草堆里睡。从鄂城到武汉，只有八十多公里，我在路上走了十四天，平均每天只走六公里。

到武汉后，找哪个地方落脚呢？到市区里去不大安全，因为武汉解放不久，也肯定在抓我们这样的人。我吃了这么多苦跑出来，如果在武汉被抓住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想了半天，我想到了在武汉南湖机场附近的“八大家”（地名）种菜的陶老二。他是我过去的部下的弟弟，到他那里去，他如果对我客气，我就在那里住一段时间再说。

到八大家的那天，已是下午三点多钟。我见八大家菜地有几个人在干活，便慢慢磨到一个戴草帽、正低着头在盘弄菜的菜农身边轻声问道：“请问先生，这个地方是叫八大家吗？”那个菜农头也不抬地答道：“是的。”我又问：“黄冈县上巴河区陶家大湾有个姓陶的住在这里吗？”那个菜农见我这一问，停住手里的锄头，把头一抬，眼睛盯住我反问道：“你是不是陶耀华？”他这一问，一切我都明白了，他就是陶老二。陶老二见我面黄肌瘦，筋疲力竭，身上又是泥巴又是血，脚肿得又厉害，很同情地对我说：“朝你身上一看，我就知道你